

“反改革”者的“祖传”“逻辑”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于是有反改革者，于是又有反改革者的种种奇谈怪论。这一点，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影响最大的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改革的涛声不绝于耳，改革的风浪此起彼伏，但“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反改革的奇谈谬论也嚣然尘上。1925年3月12日，鲁迅写信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愤慨地指出：“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反改革’的人们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一》）为了反击他们的奇谈怪论，在这封信寄出以后，鲁迅接连写了《论辩的魂灵》、《牺牲谟》等别具一格的杂文，将“反改革”者的“逻辑”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给了他们以有力的打击。在《论辩的魂灵》的开头，鲁迅写道：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件，名叫“鬼

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但贴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贴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出来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乱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接着，鲁迅就将“鬼画符”上的“逻辑”妙论“摘录数条，以供同好”。用让“反改革”者现身说法的办法，将他们的谬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且来辨析其中的几条。其一：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其中包含着如下的推理和判断：

(1) 推理：

洋奴会说洋话；
你主张读洋书（说洋话），
你就是洋奴。

(2) 推理：

洋奴崇拜洋书；
洋奴是人格破产者（即无价值），
所以洋书无价值（“其价值从可知矣”）

(3) 判断：

我读洋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学校的功课 政府的功令”）

(4) 判断：

凡反对我读洋文的就是“反对政府”者。

(5) 推理：

反对我读洋文的就是“反对政府”者；

“反对政府‘者’人人得而诛之”，

所以反对我读洋文者“人人得而诛之”。

略具逻辑知识者都不难辨析这些推理和判断的谬误。推理 (1) 大小前提里两次出现的“说洋话(者)”应起中项的桥梁作用，但由于它一次也不周延，所以不能将大前提的主项“洋奴”与小前提的主项“你”联结起来。这样，结论强行将大小前提的主项联结起来，就得出了不合逻辑的结论。推理 (2) 的逻辑结构与逻辑错误与 (1) 是雷同的，同样得出了不合逻辑的结论，判断 (3) 本身并无逻辑错误，但它与推理 (1) 对“读洋书”的否定，构成了逻辑矛盾，违反了矛盾律。判断 (4) 的逻辑结构虽无毛病，但其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一个内容不正确的判断，推理 (5) 以错误的判断 (4) 为大前提，尽管推论过程遵守了规则，仍就推出了错误的结论。

其二：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

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这里包含着八个推理：

(6) 推理：

“你说甲生疮”；

“甲是中国人”，

“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

(7) 推理：

“中国人生疮”；

“你是中国人”，

所以，“你也生疮了”。

(8) 推理：

甲生疮；

你也生疮，

“你就和甲一样”。

(9) 推理：

如无自知之明，他的话就无价值；

你“无自知之明”，

“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

(10) 推理：

卖国贼是说谎的；

你也说该，

“所以你是卖国贼。”

(11) 推理：

凡骂卖国贼的都是爱国者；

“我骂卖国贼”，

“所以我是爱国者。”

(12) 推理：

“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我是爱国者”，

“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

(13) 推理：

我的话是不错的；

我说你是卖国贼，

所以“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其中，推理（ 6 ）的小前提“甲是中国人”的谓项不周延。根据推理规则，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否则就要犯“结论超出前提范围”的逻辑错误。推理（ 6 ）中，结论“中国人生疮”的主项“中国人”为周延，犯了“结论超出前提范围”的错误。推理（ 7 ）以推理（ 6 ）的错误结论为大前提，从而又推出了错误结论。推理（ 8 ），大小前提中相同的概念“（是）生疮（的人）”一次也不周延，不能起中项的作用，强行推出的结论“你就和甲一样”无必然性，不合逻辑。推理（ 9 ）的小前提是从以上错误推理得出的错误判断，因此，使这个推理的结论也错了。推理（ 10 ）与前述推理（ 1 ）、（ 2 ）、（ 8 ）一样，犯了“中项一次也不周延”的逻辑错误。推理（ 11 ）的大前提不正确。骂卖国贼的人，出发点不同，目的各异，有的确为爱国者，有的自己也是卖国贼。鲁迅的《好东西歌》写道：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

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

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好东西歌》非常深刻、生动地揭露了“你骂我来我骂你”的不过都是一丘之貉。由此可知，“凡骂卖国者的都是爱国者”这一大前提是不正确的，由此推出“我是爱国者”，也属荒诞不经的结论。推理（12）的小前提错误，因而结论也错误。推理（13）的大前提是由推理（12）错误地推出的结论充当的，所以，由此而推出的结论也不合逻辑。

其三：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这里，“我”以为“你”不是“人”的依据是两个推理：

（14）我如果叫你爹爹，你就是我的爹爹；
“现在我就叫你爹爹”，
所以，你就是我的爹爹。

（15）畜类的爹爹是畜类；
“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
“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推理（14）的大前提是一个假言判断。假言判断的前件与后件必须存在有机联系，从前件能推出后件。否则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14）的大前提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因为从“我叫你爹爹”推不出“你就是我爹爹”来。大前提既错，结论也就错了。推理（15）的小前提是推理（14）的结论，因此，推出（15）的结论自然不正确。

此外，《论辩的魂灵》中还有许多条诸如此类的“祖传”“逻辑”。鲁迅将“反改革”者的“逻辑”精髓加以提炼，极为生动地让他们自我暴露，极尽冷嘲热讽之功，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启发：“反改革”者的嘴脸原来如此！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给今天的实践提供借鉴。今天的“反改革”者的谬论，有不少是与“鬼画符”如出一辙的，切切不可上他们的当！



漫评对改革的一种议论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稳步地向前发展。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赞扬。但是，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走的每一步路一样，总是有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溯其原因，心怀嫉恨者有之，闭目塞听者有之，推理不合逻辑者亦有之。例如有的人专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觅言外之意。你提倡“这个”，他就说你必定反对“那个”；你强调理想、纪律，他就说你不要改革了，要“收”了，等等。这种人的推理是很不合逻辑的。这使人不由得想起《战国策·魏策》中的一段故事。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

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问曰：“奚笑？”

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

文侯曰：“善！敬闻命。”

这类故事在史籍中比比可见，“见惯不怪”，大家习以为是不加究诘。其实是很值得一议的。

田子方的推论是：

国君或乐于办理政事，或乐于欣赏音乐；
您（魏文侯）乐于欣赏音乐，

所以，您在政务上怕是一个聋子。

凡事都有一定的度量关系，“过度”，就会出毛病；不“过度”，则不成问题。欣赏音乐与办理政事也有度量关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在那儿欣赏音乐，连办政事的时间都不存在了，当然不行。即使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欣赏音乐上，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君来说，也是不适当的，难免“聋于官”。但是，如果在政务之余，稍事休憩，听听音乐，看看戏剧，不但不影响政务，反而能收积极休息之益，使人在工作时精神更加饱满。魏文侯是在什么度量关系上接受田子方的谏议呢？从《魏策》的上述记载中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只能就事论事地对这段文字进行分析：“办理政事”与“欣赏音乐”二者并不绝对排斥，一般地说，是相容的；以相容选言判断为大前提，不能采取小前提肯定一部分选言肢而结论否定另一部分选言肢的形式进行推论；因此，田子方担心魏文侯“聋官”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魏文侯却赞之曰“善”。这一“善”非同小可，后世的帝王都一齐标榜起自己是个“宵衣旰食”地勤于政事的好皇帝来了。也许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吧，古往今来的文化名人，大多被渲染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怪物。其实，这种怪物是极少的。

一见中央领导人强调理想、纪律，就说不要改革了，这与田子方的逻辑如出一辙。可列成如下推论式：

或抓理想、纪律，或抓改革；
你强调理想、纪律，

所以，你不要改革了。

须知“理想、纪律”与“改革”是并不矛盾的，“抓理想、纪律”不但不会削弱改革，反而有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上列推论式中，大前提是相容选言判断，小前提肯定大前提的部分选言肢，结论否定另一部分选言肢，违背了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

善于分析这类逻辑错误，十分重要。现实生活中，不知不觉中犯这类逻辑错误的，实在太多了。例如，一个姑娘出全勤、守纪律、生产任务完成得比别人好，可是，仅仅因为她好打扮，就不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其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根本不影响生产。穿着与生产二者是相容的，把二者对立起来进行推论，显然错误。又如，有些同志出于好心，却错误地把恋爱、结婚与学习、工作对立起来：

或努力学习（工作），或与人恋爱（结婚）；

你与人恋爱（结婚），

你就不能搞好学习（工作）。

这样的说教，用心诚然不错，但说服力总是很差的，其原因就在于不合逻辑：既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也不符合思维的逻辑。

宋朝诗人卢梅坡曾写过《雪梅》诗，其中第一首是：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梅、雪争春，这是诗人的想象。它所揭示的道理，

却有普遍意义：相容的两物，不应对立看待。有些同志见别人有某些长处就嫉妒。有些领导不愿看到下属比自己高明。其实，同志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可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一下思维方法，使之合乎逻辑。小而至于生活琐事，大而至于国家大事，莫不如此！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句，长期以来，曾被人片面地引释为对谬论的批驳剖析，其实，陶渊明这两句诗的原意是写良友过从之喜、促膝恳谈之乐，大意是：有了珍奇的文章则共同欣赏，遇到疑难的道理就一起剖析，这哪里是什么对谬论的批判剖析！陶渊明读书绝非“不求甚解”，而不过是不愿穿凿附会，由此可见一斑。

古往今来，“奇文”不少，“欣赏”者更多，但精研细读，聚众详析，从而深得作者之本意者，却不多，倒是常常发现有粗枝大叶地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至曲解作者原意的情况。

笔者曾多次见人引录《国语》之《叔向贺贫》与柳宗元之《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并从中得出“贫不足畏，穷且可贺”的谬论，就是一例。

《叔向贺贫》与《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堪称奇文。

《叔向贺贫》的大意是：韩宣子忧贫，叔向非但未寄同情，给予“赞助”，反而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叔向说：“从前栾武子没有百人的田产，以致管祭祀的官连祭器都不齐全。可是，他德行高尚，遵守法度。因此声名远扬，诸侯亲近他，戎狄归附他，免除了种种患难。郤昭子则不然，家私倾国，

恃钱仗势大摆架子，结果被人陈尸在朝，同族也被杀灭，原因就在没有道德。现在你有栾武子的穷苦，必能仿效栾武子的德行，所以来庆贺你。若是不忧道德的不立，却愁钱财的不足，那要吊你还来不及，还要贺你什么呢？”韩宣子听了扑地跪拜，连连顿首道：“我快灭亡了，全仗你的开导。这等恩惠，我和家族将永远拜受！”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的大意是：得知失火，本要吊慰，现在改作庆贺；如果烧得精光，则要格外庆贺，为什么？因为你有才华、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又富贵异常，所以使得人们不敢赞扬你、提拔你，怕被人说是得了你的贿赂。现在幸而被天火烧了您的财富，众人的疑虑也一同变做了灰尘，你的才能也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不是不必吊慰而可庆贺么？

《叔向贺贫》，题目就以奇取胜；《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更是令人惊诧莫名。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贫》与《贺失火》不仅是“奇文”，且大有“疑义”。这“疑义”主要在于：“贺贫”是表，实则“贺”因“贫”而重“立德”；“贺失火”也是表，实则“贺”因失火而显出了有才。许多人不知“贫之可贺，全在有德”，“失火之可贺，全在显才华”，却把“贫”与“失火”当作了“贺”之根本原因，就不免大错特错了。

从《叔向贺贫》、《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得出“贫不足畏，穷且可贺”的结论的人，首先犯的逻辑错误就是不当归纳。其归纳推理是：

从《叔向贺贫》可知贫穷可贺；

从《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可知贫穷可贺；

.....

所以，贫穷可贺。

这个推理包含两个逻辑错误：

一为前提不正确，两篇“奇文”虽然标题上有“贺贫”、“贺失火”之词，但其真意却在“贺”立德、“贺”有才。这一推理的前提把表面言词当做作者真意，并用以推理，结论是不免错误的。

二为把并无必然性意义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结论当成了必然性判断，从而认定“贫不足畏，穷且可贺”。

从“奇文”得出“贫不足畏，穷且可贺”结论的人，其次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以“贫不足畏”为前提，推出越穷越好的结论。其推论过程，运用的是关系推理，按传递关系推理来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公式：

$$A > B$$

$$B > C$$

$$\therefore A > C$$

在这个公式中，“ $A > B$ ”、“ $B > C$ ”这些前提，必须真实正确。如果不真实正确，结论“ $A > C$ ”也就不可能正确，我们已经知道，“贺贫”、“贺失火”只是“奇文”之表，并非作者的真意，作者的真意是“贺”立德、“贺”有才。这样，把“贺贫”当作作者的真意，从“贫”比富好，“大贫”比“小贫”好，从而推出“越贫越好”，是难免不错的。

可叹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相当长

时间里，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穷光荣”观念，是十分广泛、十分顽固的，以至于“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谬论，居然也能迷惑了許多人。现在，党拨乱反正，我们懂得了“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如果谁还不思改革，不承认我们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不积极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可要与之“析”“疑义”，请他们靠边了！



吾文共的意 疑义相与析。

“小马克思”不是马克思

有一位同志，在延安时代就被中央领导同志称作“小马克思”，写过不少好文章。可是，据说他从1958年到今天，只发表过两篇文章。问他原因何在，他说：“马克思说过的，还要我去说什么？马克思没说的，我怎么去说？”

这段自白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有人对这一解释摇头；又有人为之辩白，认为1957年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状况是“小马克思”为此消极的充足理由，值得同情。笔者虽然未能对“有人”与“又有人”的数字作深入的调查，但联系近五、六年来的所见所闻，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会同意如下估计：“又有人”比“有人”多得多，或者说，“又有人”对“有人”占压倒的优势。不是吗？——长期以来理论界许多人对自己的无所作为，就是采取这种上推下卸的态度的。

其实，这是儒夫的遁辞。

诚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不利于理论工作者心情舒畅地工作。然而，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环境难道是正常的吗？他的一生，不是由于为抨击资本主义说过大量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而受尽了迫害吗？就拿“小马克思”来说吧。当他在延安时，就延安这个小环境而言，虽然是有利于他“写了许多好文章”的，但就旧中国这个大环

来说，不是搞马克思主义就有杀头之虞吗？我们毫不怀疑，“小马克思”当年投身革命，奔赴延安，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身家性命的。“从1958年到今天”呢？恕我直言，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已经消失殆尽了。因此，为之辩白、表示同情者，起码是犯了两个逻辑错误。其一为，下了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

只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假言判断有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和充分而且必要条件假言判断之分。上述判断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应是后件的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无此前件必无此后件，有此前件却未必有此后件。那么，“好的政治环境”是否“写出好的文章”的必要条件呢？没有“好的政治环境”是否一定写不出“好的文章”呢？实践已经证明，“好的政治环境”并非“写出好的文章”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判断是错误的。其二为，根据这一错误的假言判断作了一个错误的假言推理：

只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他没有好的政治环境，
所以，他没有写出好的文章。

这个推理的形式是正确的，合乎逻辑，但它“先天不足”，由于大前提错误，推出的结论仍不合逻辑。

不仅为之辩白、予以同情者犯有逻辑错误，而且，“小马克思”本人的解释也是违反逻辑的。

据说 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亚历山大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